

# 界河赤子 心中丰碑

——追忆孙庄老党员、老村干缪同庆

□ 缪文山 缪根山

在如东县袁庄镇孙庄村，有一位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老党员。他家境贫寒，穷则思变，立志参加革命，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让更多的穷人远离饥饿、走向光明；他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入党，勇于牺牲自我、忠诚于党，用信仰铸就了不朽的辉煌；他不忘初心、使命担当，坚守信仰，矢志不渝，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；他对后代着眼于价值观的培养，用自己的艰辛和奉献精神磨砺出的人生华丽篇章，诠释忠诚与信仰的力量，铸成老一辈的楷模，点燃了后人前行路上的梦想。他传奇的一生成为一座星光璀璨的时代丰碑，激励人们不断奋进。

他，就是中共老党员、孙庄村原老村干、家父缪同庆。

## 穷则思变 立志革命

我的老家在袁庄镇孙庄村界河边，这里以穷闻名，原是无主荒地。一些乞丐们沿途行乞来到此地落脚安身。我们家就是随着穷人迁徙的大军过来的，家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环境里，后来家里虽有两间小茅棚，但外面下雨家中下。祖父缪志武、祖母康四梅租种地主家的几亩地，遇上旱灾，庄稼全部被晒死，如果遇上水灾，田里一片汪洋，太阳一晒起盐霜，庄稼全部死光；大雨一下浪打浪，颗粒无收去逃荒。为了保命，家家户儿带儿女讨饭度日。家父刚刚会走路，就跟着祖母外出讨饭求生。那时到发财的人家讨要吃的很难，她们还时不时地挖野菜、捋榆树叶儿，供全家五口人充饥，维持生命，生活极度艰难。

在旧社会，富人家有红、白喜事时，视丐帮为财神，必须热情招待，以图将来发大财。有一天，一富人家办喜事，界河边讨饭人闻风而动，陆续赶到。主人首批安排了18桌要饭的，一看旁边还有4个人没位置，就赶忙再安排了半桌让他们坐下吃饭。故界河边的“十八桌半”名扬十里八乡，流传至今。

有一年的冬天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家父跟着祖母出去要饭。因一直在雪地中行走，傍晚回家后裹脚布与脚趾冻得粘在一起，剥都剥不下来，后来用温水泡脚，疼痛得钻心，哭声不断。有一次外出行乞，被富人家的恶狗咬伤，含泪痛哭，家父在祖母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行在要饭的路上。

听说洋涨庵（今河口镇）一带富人多饭好要，家父就拉着两个姑姑跟着祖母步行二十多里路前往，“好爹爹、好奶奶”地喊上半天，心好的人就给一勺糝儿，不客气的人家用大拇指垫在勺底，上面盖上一勺糝儿就打发了。

一次在洋涨庵乞讨，眼看天色已晚，因路远来不及回家，祖母好言相求，借宿在一个人家的锅门口（灶台的烧火间）。辛苦一天的她们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熟睡后辛苦一天讨来的一点粮食全被偷光，母女们抱头痛哭。

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，积劳成疾，于1939年9月26日不幸病逝，祖母号啕大哭。时年18岁的父亲协助祖母料理丧事，接下来孤儿寡母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

穷则思变，立志革命。1940年3月，新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日伪军的重兵“扫荡”，开辟了苏中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，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日益壮大。20岁的父亲，听说共产党、新四军

的到来十分兴奋。他在我党领导的斗争形势鼓舞下，积极配合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，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，废除苛捐杂税，土地改革等运动，逐渐成长为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。

## 抗日烽火 光荣入党

1942年，在抗战最激烈、最艰难的时期，凶残的鬼子采用“以战养战”的方针，把南通、如皋东（今如东县）、启东、海门等苏中地区，作为消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实验区，疯狂掠夺各种战略物资。1943年4月，日伪军还耗费500万根毛竹，从天生港向北到丁堰，再转向东至双甸、马塘掘港直至黄海边，构筑长约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，还设了100多个检问所，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，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封锁，实行惨绝人寰的“三光”政策，逼得老百姓毫无活路。

“坚决不做亡国奴！”江苏先后在县、区、乡级建立“农抗会”，家父勇担乡农抗会负责人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。他与孙伟经（建国后任如东县委书记）、孙恒彪等积极分子，在双甸一线采取怠工、毛竹浅插、或将原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等手段破坏竹篱笆。同时，积极开展放哨，为党的组织传递情报等抗日活动。1943年7月1日晚上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袭行动，将日伪军长达三个月构筑起来的竹篱笆一夜之间就烧为灰烬，家父为胜利拍手称快。

1944年初，家父参加新四军苏中部队开展的打破日伪“清乡”“屯垦”斗争，主动地、有重点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，在如皋东乡，首先于如皋海河滩（今袁庄镇海河滩）歼灭日伪500余人，打破了日伪“清乡”封锁线。

在这个时期，党组织安排家父为地下交通员。他按上级要求，多次及时准确送达情报，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清剿、反扫荡、反渗透斗争，有效地阻止了日伪的侵袭，保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家父严格执行地下交通员的工作要求，他曾有好多次跟我母亲刘桂芳一起在地里锄草，不知何时他撂下锄头人走了。我母亲到处找都不见他的人影。后来才知道他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参加会议去了。至于开会地点、会议内容、与会人员等等，从不透露给我母亲，保守党的机密守口如瓶。每次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准时完成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安全和利益。

这一年，父亲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就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事业，为人民过上好日子而艰苦奋斗。入党后，父亲不忘初心，听党话、跟党走、遵党纪、守机密。并介绍一些表现突出的先进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 不忘初心 使命担当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，随之而来的内战开始，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。内战爆发后，父亲参加民兵队。

父亲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。1946年至1947年间，他认真落实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和全县农民代表

大会要求，组织群众“开大会、斗地主、分田地”，落实“耕者有其田”的要求。接着落实《土改复查纲领》，按照“三查八比”的要求，组织开展并完成了土改复查工作，保证“胜利果实”的公正分配，防止了“左”的偏向，在本地没有出现乱打“翻身棍”、挖“浮财”等现象，他负责的土改复查工作没有拖全县的后腿。

1948年，父亲组织军鞋支援解放军和民兵作战。比如他走家串户组织徐明、汪兰芳、薛来明等许多妇女进行军鞋缝制、打包、运送，为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时，组织上准备派家父随队南下，但由于他耳朵的听力出现障碍，党组织安排他继续留在地方工作。无论是在前方或在后方，家父都不忘初心，虽不是战士却同样以冲锋的姿态战斗在地方工作第一线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父亲在乡村开展农村工作，宣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。发动群众开展互助，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。他先后担任过互助组组长、农业合作社社长、乡干、村支部委员、协管员等职。人民公社建立后，他一直担任大队党的支部委员兼党支部书记。

参加工作以来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，对人民极其关爱。在地主家抄了许多金银珠宝，我父亲一样都不要，全部分给了劳苦大众。组织上决定分给我父亲三间瓦房，父亲婉言谢绝，最后分了地主家两间草盖的前山屋及两间厨房。组织上拨下来的救济粮、救济款，只要是他经手的，都全部发给困难户。群众热情地说：老乡干就是好，我们的利益少不了。

## 培养后代 重在身教

父亲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、对社会和家庭极端负责的人。他虽没有过高的文化水平，但他有超前的育人思维，他用自己的优良品质和言传身教感染后代，确保我们健康成长，不辱使命。

父亲是一位普通人，他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，在担当中度过了青年，在奋进中度过了中年，在期盼中度过了老年。他要过饭、挨过饿、打过仗、当过“官”、吃过食堂、上过河工。他留给后人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本发了黄的家庭支出“记账本”、一根桑木扁担、一辆木制独轮大推车和一个党费交纳本。他的这些精神遗产集我国农民党员苦难史、奋斗史于一身，集父辈的责任和担当于一体。中国共产党给了他翻身的机会，他那一言“不能忘本”的名言讲了一辈子，他对新一代的传统教育做了一辈子，他对年轻一代的培育义务尽了一辈子。

文革时期他是当地著名的忆苦思甜讲师。由于父亲的特殊经历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当地的袁庄小学、袁庄中学、西凌小学、农二中等周边学校纷纷请父亲去做报告，他针对一些青年学生明显忘本的倾向开展传统教育。那个时候他的课期安排得满满的，几乎成了不在编的讲师。每次上课他都要提前认真准备，徒步前往，不拿报酬，深受好评，并成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一员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在生产队和家庭等场合组织开展忆苦饭的活动。忆苦饭的材料选择玉米面、山芋叶子、榆树叶、麸子、烂菜叶、芋头花、南瓜花、萝卜缨、野菜、米糠等。

社会生活中他是知名的导师。建国

以后，农民的生活一步步向好，但是农村中家长里短的事件时有发生，有的把矛盾闹得不可开交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。每当这时，左邻右舍都会跑来请“缪老”前去调解。父亲会通过传统的礼仪孝道等理论疏导帮助，把矛盾的扣子解开，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让正能量充满乡村。

在家庭，他是一位称职的老师。父亲倡导正人先正己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家要先做好。自从他1944年入党之后，他就一直扮演“干部”的角色，他在党小组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临终。

父亲身教重于言教。他生在旧社会，没有上过学，由于自己刻苦努力，也认识好多字。因为自己没有读过书，父亲对子女的学习和做人非常重视。他说：虽然家里穷，砸锅卖铁也要让下一代上学读书。为了挣钱给子女念书，父亲常常日不夜夜不眠地拼命劳作，除了在队里上工，先后十几年帮我家附近的代销点运货。推小车行小船，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，都一直坚持为代销点当搬运工，一心想着多挣几个钱给孩子缴学费。在一个寒冬的下午，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去袁庄运货，一个人推上200多斤的东西十分困难，就趁孩子、次子在袁庄初中读书放学的时候帮他背车子。父亲在后面推着车子，长子、次子用绳子拴在车头往前背，载满货物的车子吱呀吱呀地行走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。父亲推得满头大汗，浑身乏力，一不小心小车滑进了路边的沟渠里。父亲没有责怪孩子们，他忙爬下沟，将车上的货卸下来，把车子推上岸，再重新装好货。父子仨将一车货推到代销点的时候，已是万家灯火。按每一百斤三角钱计算，往返袁庄需行近十六里路，挣了六角几分钱。寥寥无几的收入，却让父亲内心很满足，他早已将小车翻下沟的情景忘得一干二净。

1966年我们家八口人，挤在两间房子里，过着蜗居的生活，为了翻建房屋，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争取毛竹计划支持、砍伐家前屋后的杂树做柃条，用竹壳做椽子、板瓦（芦柴编的帘子）上面抹烂泥，盖上小麦秆，建成了6间土墙茅草屋。整个建房中要算打旺最苦最累，每片旺大约1.4×6米共需18片，请人打旺开不起工资，父亲就领着长子两个人干，手皮被芦柴儿磨破了，用布裹起来继续干，先后花一周时间才完成任务。新房落成以后，父亲见全家人住进新居，铁黑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父亲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年腊月二十四，他的右手食指意外戳进了木刺，几天后，发起高热，儿女们送他去次子工作单位附近的马塘医院就诊。医生确诊为败血症，需将食指第一节截除，父亲二话没说，配合医生做了切指手术。

五十年代，家家户吃食堂。开饭时，每个人家都拎上一个钵头去生产队食堂打粥。当时我们家五口人，按人口从食堂打回来的粥每人还盛不到一碗，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，父亲就用预先烧好的开水掺在钵头里，稀释后先让长身体的儿子们吃，而他自己却用榆树叶、榆树皮和野菜蒸着充饥。

三年严重困难，我们家喜事连连迎弟妹出生，但生活更加困难，就连国家每人一年发的7尺布票也无钱去买

布，父亲整天为这个家发愁。实在没有办法，父亲只好把家中可以卖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去变钱，就连家里自产的一些胡萝卜也派上了用场。冬天的晚上，父亲带着长子和次子与邻居结伴，把胡萝卜用小木船运到耕茶去卖，在小河里，他扶着竹篙上的冻凌一篙一篙地撑船，一撑就是二十里的水路。到了耕茶运河，他们才可以轮流背纤，装上百十斤萝卜到次日天亮，才赶得上耕茶早市，每斤萝卜一角钱左右，一个来回一天一夜，仅获得十几元的收入。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，而父亲却露出了满脸的笑容。

为了我们兄妹5个上学读书，父亲吃尽了千辛万苦。当时家境清贫，有极少数邻居还在看笑话，风言风语地说：老缪家生了4个儿子，将来娶儿媳就困难了。可我父亲不信这个邪，他坚持生一个，养活一个，教好一个。为此他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披星戴月地拼命干活，把攒到的钱全部用在培养孩子身上。到了入学年龄，他就亲自把孩子一个个送进校园。面对缴纳学费、学费困难时，他坚定地讲：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。

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艰辛培养教育之下，五个孩子个个都读完了高中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孩子都一个个走出了校园。先后把两名孩子送进了军营，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；另两名孩子成为三尺讲台上的人民教师。孩子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力拼搏，工作都很出色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家有两名部队的营、团职干部和两名优秀的人民教师，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当时全家连他共有5名党员，令无数人羡慕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灵机一动，建立一个家庭临时党小组，自认党小组长，他规定每逢儿子们探亲回家到齐时就开家庭党小组会议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张罗好菜，父亲准备党课内容。会议的内容不外乎学习党的理论文章，教育我们学党史、不忘本，听党话、跟党走、不变心，强调党纪党规，倡导清正廉洁，奉公守法，永远做有益于人民的人。讨论家庭重大的事件也在其内，以此来强化家庭的和睦友好，做到内部矛盾不请外人调解。直至今日，父亲上党课的声音还时常在我们耳边响起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们兄弟四个小家庭都已“羽毛丰满”，确实没有必要再团在一起。为了简化分家的程序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，老父亲及时召开了一个临时党小组会讨论分家，允许四个儿媳（党外人士）旁听但没有发言权。他以党小组长的身份把家里的坛坛罐罐一划拉，就把十几口人的大家分成了五个小家，整个会议用时不到一小时。

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，我们自觉严格要求，个个都成为了单位的优秀党员。现在都光荣地退休了，2024年有兄弟2人获得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纪念章。

回首岁月，我们深感父亲与生俱来的高大，他宽阔的肩头上背着的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；他巍然屹立的背部，是我们抵御风雨的一面墙；他的名字，在我们心里是无所不能的一种骄傲；父亲如同一座丰碑，是他撑起一片蔚蓝的天而成为我们前行的标杆！

父亲，您是一座永远的丰碑，您永远活在人们心中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#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